



“大家讲堂”  
翻译文化讲座集锦 I

# 纵横： 翻译与文化之间

Senior Experts  
o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王欣 主编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大家讲堂”  
翻译文化讲座集锦 I

# 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

Senior Experts  
o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王欣 主编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大家讲堂”翻译文化讲座

集锦 I / 王欣 主编.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ISBN 978-7-119-05529-9

I. 纵… II. 王…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672 号

策 划：王 欣 呼宝民 成 德 顾巨凡

责任编辑：蔡莉莉 李 璐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印刷监制：张国祥

## 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

王欣 主编

©2008 外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 话：(010) 68320579/68996067 (总编室)

(010) 68995844/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68996164 (版权部)

制 版：海风书装

印 制：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小 16

印 张：21.75

字 数：250 千字

装 别：平

版 次：2008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05529-9

定 价：39.80 元

建议上架：外语类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印装问题可随时调换

# 前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交流无论是流量还是信息的质量都大幅度提高。翻译，作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也日益突显，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怀着满腔的热忱投身到这项事业当中，可以说，我国翻译学习的热情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阶段。

顺应此潮流，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在2006年开始举办面向社会的公益性“翻译与文化系列讲座”，围绕翻译与文化的主题，每月邀请一位翻译名家传播翻译文化、传授翻译经验、讲授翻译技巧。讲座推出后，深受广大翻译爱好者的喜爱。2007年，我们将翻译与文化系列讲座正式命名为“大家讲堂”，即：请“大家”传授翻译知识给“大家”。

两年多来，在这二十多期的讲座中，我们邀请的专家中既有为翻译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老翻译家，例如林戊荪、沈苏儒、张载梁、过家鼎、林国本、王若瑾等老前辈，他们把几十年的翻译经验无私地与听众进行分享，也有依然活跃在翻译事业上、担任国家重要翻译任务的专家，如黄友义、施燕华、陈明明等，他们生动地为听众讲述现今翻译状况以及实际翻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在异国文化背景下工作的老师，如鲍川运、施晓菁、叶子南、张佩瑶等，他们用广博的经历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另有

来自高校的教授，如梅任毅、吴冰、陈德彰、王恩冕、麻争旗等，他们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知识积累讲授了语言学习、文化背景、影视翻译、翻译学习方法等实用性内容。讲座老师学识渊博，讲授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让听众领略翻译魅力，体会到翻译道路上的艰辛，也收获实用的翻译指点。

集中国内外如此之多的翻译界专家到“大家讲堂”，本身就十分精彩，但能到现场聆听讲座的毕竟是少数，如果把那么多精彩仅仅留在讲座的现场，对专家、广大翻译爱好者和我们组织者来说，都是一种遗憾。为此，在各位专家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编辑了部分讲座内容，在外文出版社同仁的帮助下，使得这些讲座能和更多的翻译爱好者一起分享，也使得各位老师的翻译精髓和心血得以保留。

正因为此书是在讲座现场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因此文体上也保留了比较口语化的风格，部分与听众的互动也同样附录在讲座后面，这样可以使读者有亲临现场的感受。

希望此书能弥补未到现场聆听讲座的遗憾，给未曾参加过我们讲堂的朋友带去一场翻译盛宴，尽情汲取宝贵的经验，为翻译爱好者们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帮助。

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讲座专家们及一批专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因版面原因，恕不能一一列出，但我还要特别感谢外文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无私支持。

王 欣

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2008年9月

# 目 录

- 001 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黄友义
- 021 从《骆驼祥子》中的翻译看中西语言文化 施晓菁
- 047 我在联合国作同声传译的日子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及比较 王若瑾
- 075 翻译与语言文化探究 林戊荪
- 101 从信达雅谈长句的翻译 沈苏儒
- 123 谈英语语言与文化的三个层次 梅仁毅
- 137 我的口译生涯——谈做口译人员的体会 施燕华
- 157 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漫谈口笔译的异同 张戟梁
- 187 谈谈称呼语与寒暄语的翻译 陈德彰
- 207 同声传译——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鲍川运
- 223 中国特色词汇的解释 陈明明
- 245 如何使写作达到预期的效果 吴冰
- 277 “小心坠河”是“carefully fall to the river”的意思吗？  
——浅谈汉译英的困难与对策 张佩瑶
- 293 标题的翻译 王恩冕
- 315 如何做好外事翻译 过家鼎



黄友义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曾留学英国和美国，目前担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大中华文库》丛书（汉英对照）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副主编等职。译著包括美国文学名著《名利场大火》、《中国加入WTO与经济改革》、《中国旅游》等。此外，他还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中译英书稿核定工作，多次参加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翻译工作，主持编写了《汉英外事工作常用词汇》。

全球化时代需要更多的翻译爱好者，然而，更加急需的是真正职业化的翻译人员。

做一名合格的职业翻译，需要懂语言，懂专业，更需要懂外国文化。职业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在两种语言的互译当中，准确地翻译出两种文化的真谛。

黄友义

# 中译外

## ——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黄友义

这里讲述汉译英过程中遇到的有趣的文化故事，令人困惑的文化疑惑，以及引人深思的文化冲突，以此来告诉大家汉译英过程中应注意和回避的问题，怎样去通过翻译巧妙地进行文化转换，使译文更加地道和贴切。

我这次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定此题目不仅是因为我在30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主要从事中译外，经历了从不懂到懂、从不喜欢到喜欢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这样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要走向世界、融入国际，仅仅靠中文是不够的。特别是近

几年来，大家在很多领域都会听到“走出去”这个词，经济要走出去，文化要走出去，教育要走出去，新闻出版也要走出去。要“走出去”，中译外的重要性、迫切性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

目前，我国中翻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中国从政治、外交、经济到科技、旅游业，乃至一个产品的出口都需要与世界交流。例如中美战略对话就离不开中译外这个关键的环节，旅游也从最早的几百人到现在每年的四千万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而且人数还逐渐增加，所以从面上来讲，中译外的需求量比以前大得多。另一个是从纵向来看，中央到地方，也就是从国家级的对外交流一直到基层的对外交往的任务更加频繁和繁重了。由此可见，中译外对中国人来讲也是特别的需要，并且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任务量越来



越大。虽然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很多地方出现了汉语热，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年或是十年就能够解决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语言在国际翻译家联盟被定位为“**language of limited diffusion**”，过去被翻译成“小语种”，但我个人认为应该表述为“非通用”语言。联合国工作语言里，虽然包括中文，但这是一个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因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统治世界几百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我们虽然国力增强了，却还不足以让汉语在全世界流行。

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古老和丰富的文化，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希望和需要了解中国的国家和人群也越来越多，对中国情况关心的面也越来越宽。我们自己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介绍出去。因此，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用外文，特别是用英文介绍中国，就需要中国的翻译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我们做得怎么样呢？实际上，中译外尽管这么重要，但存在的问题仍然非常多。一类是语言水平问题。一些学中文的人非要用外文来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完成一个中文的概念，这是在“以己之短，攻人所长”，难免会因为语言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笑话。大家知道网上这种笑话都很多，从一般的小错误到极端的错误。一些外国刊物，特别是以前的《远东经济评论》中专门有一个栏目叫“**travelers' tales**”，内容都是一些外国人到亚洲国家看到的一些“都市语”或者是广告方面的错误，把这些错误当作是笑话，拿出来给大家取笑。即使是正式的出版物，白纸黑字印出来，经过国家有关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东西，其错误也很多。比如说一个地方气候湿润，不像北京这么干燥，但是翻的却不好，用的是“**humid**”这个词，“**very humid**”，那是闷热的，并不是湿润的意思。“山石峻美”，翻成“**dangerous**”（危险的）这个词，这是一个语言问题。还

有，我曾经见过一本书，书名就叫“xx is going globally”，翻成中文成了“xx 在围着地球整天转”。我知道他们想表达的是“xx 正在走向世界”。还有一类错误是由于翻译人员对外国文化知识了解有限。这种错误往往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犯的，比如美国人学了点中文，就当翻译，汉语水平虽然还不错，但他却不了解一些文化上或政治上的概念。有一次我们在参加全国性的外文图书评奖活动时，某个省出的一本书在讲到“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的贸易时，用的是“mainland China”。对“中国”国际上原来有两个传统说法，一个是“red China”或者是“mainland China”。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翻法，因为既然有一个“mainland China”，那是否还有一个“island China”呢？因此说“China’s mainland”是对的。这就属于一些知识性的错误。

《1984》如果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其实它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它的政治讽刺意义很大。书的作者 George Orwell 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信仰写了一本书，叫《1984》。写作的时候不好定题目，出版的时候就干脆根据完成的年份（1984年）定成了《1984》。这本书后来在全世界发行了几百万册，还被拍成了电影。书中的第一人称“我”，是一个新闻记者，他所在国家的统治者、领袖被大家尊称为“big brother”。学英语的人可能会在英美文学当中看到过“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说话小心点），喻意秘密警察在盯着你。书中那位暴君在西方人眼里比斯大林还暴。但在后来一些场合里，可以发现我们的翻译也常用“big brother”，主要是因为翻译虽然水平很高，但是他不知道“big brother”这个词在英文中有其特定的意思，结果就容易闹出笑话来。我在西方上大学时，作为教材接触到这本书。所以像“big brother”这种词是不能轻易使用的。举一个比较老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宣传部”，过去都叫“propaganda department”。“propaganda”在英文中是“为政治利益服务却貌似不含偏见的宣传伎俩”，过去我们翻译“宣传部”是“propaganda

department”，后来把这个英文名称定为“**publicity department**”，对外宣传办公室叫“**communication office**”。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即“交通运输”，经常有人把“**communication**”翻成是“交通”。实际上，“交通运输”更多的应该用“**transport**”或是“**transportation**”。

这些大多都是属于知识问题，还有一些是工作态度问题。例如南方某省的介绍：我省农业发达、经济发达，在省会有一个“**marijuana institute**”（吸的毒品研究所），我对此很是奇怪。后来，通过找中文资料，我发现是种植的麻类，做麻绳、麻袋之用。这就是翻译的英文还不够成熟，或者说没有仔细查，见到麻类就想到“**marijuana**”（大麻）这个词，实际上是植物的麻类。更极端的是下面这个例子，是某个县的说明介绍：“**Last year, our county set up a prostitute factory**”，看后让人吓了一跳：还有哪个县胆敢成立妓女工厂？！其实说的是烟花工厂。烟花，以前也作妓女讲，例如烟花巷。可是这位翻译是怎么把烟花译成“**prostitute**”的呢？因为现在词典里，烟花的第一条解释都是“**firework**”。后来我终于在一本40年代的小字典里，找到“烟花”这个词条有两个英文解释。第一个是“**prostitute**”，第二个是“**fireworks**”。看来这个翻译没有动脑子，语言水平也不够扎实，查了字典就往上抄。其实，这不仅是水平问题，更是工作态度问题。

除了汉译英印刷品上的错误，其实口语中的错误例子也很多。我曾听到有人在介绍四川的旅游胜地九寨沟时，应该是“**nine-village gully**”或者是“**nine-village valley**”，但我也曾经听到一个翻译说成“**nine narrow gullies**”。这位翻译看来是把中文的“寨”听成“窄”了，而他的知识面又不够。在某个国际会议上，曾经出现过谈到我国的香蕉产量时，我们的翻译把“**banana production**”翻成了“**rubber production**”，因为“香蕉”和“橡胶”的音很接近。

还有一些不仅仅是听力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问题。中国国家领

领导人接见外国人的时候，含蓄和客气的话多，大家一落座就是：“你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里，一定很累了。”这种话，外国人一听感觉非常不舒服。左盼右顾，就想是不是自己看上去很疲惫呀？中译外经常会碰上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就会继续跟外国人说：“你们要在中国呆三天，要去很多地方，不要光看好的，也要看一些差的。”这都是客套话。之后，外国人就会跟接待人员说：“咱们的日程是不是要调整一下？”问得接待人员摸不着头脑。事实上，高级别的访问事先对行程的安排是很仔细，而且早就定得死死的。所以接待人员就回答：“不可能，没有变化呀。”外国人就会说，刚才你们的领导人还说不仅要让我们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吗？这也是翻译在处理领导讲话的时候没有多动脑筋。

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叫马跃然，他来华时见中国的一个大作家。到他家敲门，主人出来了，用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说：“哦，您来了。”这个翻译是年轻人，当场就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了。“How do you do”、“How are you”他知道，但遇到“哦，您来了”他愣住了。其实，就是“**How do you do**”，不可能翻成“**Ah, so you have come**”。

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1999年的七、八月份，我们正在开一个中译外的研讨会，我所在的外文局和外文局下属的中国网、《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几个杂志社和外文出版社，以及外交部、商务部、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国际台等单位参加了。这样的研讨会一般每年开两次，每次20个人左右，就一些中文的疑难问题或新概念的翻译进行交流。一年开两次会的原因是每年三月份的“两会”会出一批新的词汇，如果秋天开党的大会，例如2007年要开“十七大”，也要有一大批新词汇出来。这些会议文件是保密的，给翻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没有机会进行仔细交流。因此我们这些人就在会议之后，针对新词汇的翻译重新研究和推敲。在1999年夏天，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提出：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检阅部队或慰问的时候，常常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该如何翻译？后来，我想

起来 1984 年建国 35 周年的时候，靳羽西那时与内地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她当时把我们建国 35 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的录像拿到美国去，在一些当地的地方电视台播放，英文的解释是她做的。她当时解释说邓小平是军委主席，相当于美国三军司令，向士兵们致意，士兵们向他表示问候。她用英文的间接引语进行解释。另外，我要讲的是大家看过那么多反映二战主题的英美电影，首长检阅部队的时候，只是敬礼，和士兵行注目礼，他一句话不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在于，从红军过来的军队领导为了表示和战士的亲密无间，士兵为了表示对领导的欢迎、尊重和爱戴，总是会有这么几句话：“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但西方没有这个概念，于是我们商定只要谈到问候语就全都用间接引语，但是那个会有媒体没有派人参加，因此 1999 年 10 月 1 日那天就出现了“同志们好”（“Hello comrades”），“首长好”（“Hello leader”），“同志们辛苦了”（“Comrades, you have worked hard”）。每年 10 月份是法兰克福书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展，从一个展区到另一展区必须乘汽车。当地华人、汉学家到中国展台问我：“你们的翻译是怎么搞的？那么严肃的活动让你们搞得像土匪一样！什么叫‘Hello leader’？”英国人听起来像什么呢？“伙计们，辛苦了，干得不错。”“头儿，您辛苦了。”

其实这种错误不光中国人犯，外国人也犯，倒过来的例子也有，下面的这个例子就是。“to the health of the minister”，这句敬酒词，就被国外的翻译翻成“为了部长的卫生干杯”。那也是翻译一时没转过来。

另外，在出版物中，尤其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尤其是涉及政治、外交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版物，一定要更加仔细，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例如，“两弹一星精神”歌颂的不是那个“弹”和那个“星”，而是研究那个“弹”和那个“星”的人，所以应该说是“the spirit of those who successfully launched China's first Atom bomb, Hydrogen bomb and satellite”。

刚才给大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有语言的，有知识性的，

有责任性的，有文化差异性的，还有各种技术性的错误。如果从新闻出版的角度讲，一定至少需要两个人核对，一副眼睛永远是不够的，尤其是疲劳之后。口译也是这样。年轻时我有一次做同声传译，看底下有人在招手，意思是我翻译的不对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旁边一个比我资深的翻译说：“你还是休息一下吧。”然后，他来接着翻。会后，他告诉我，人家谈的是“结婚”(marriage)，正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你说的是“bury”(埋葬)。机械劳动时间长了以后，一疲劳，出错也感觉不出来。所以这个核稿人，对几十万字进行核对，又是一道工序，也没有逐字逐句地去细对，此类错误就难免出现。

对举出的这么多问题，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专业化不够。比如刚才我谈到的“xx在围着地球整天转”、“妓女工厂”这类错误。本来不是做中译外的，却承担中译外的工作，这就是专业化不够。翻译是一种创作，它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我总爱拿中西医来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要切阑尾炎，你会去找中医吗？如果你想吃点中药，看中医的切脉，你会去找西医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译外和外译中就相当于是中西医的差别。一般基础的东西大家都会学到。众所周知，博士要比硕士更专业，硕士要比学士专业，翻译同样如此，你翻译的越多，就越是高翻，专业性也就越强。我把翻译基本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擅长把外文翻译成中文，大部分人适合做这种工作。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每年引进大量的技术设备，外国的经济、文化，包括北京人每天看的报纸，那里面的外国信息都是要从外文翻译成中文。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最多，大部分人都在做此项工作。第二类是从事中译外的人。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国家外文报纸就一家《中国日报》；对外电台就是国际广播电台，当然现在各省和北京广播电台也有英文栏目；杂志出版基本都在外文局，24种刊物7个出版社；需要进行对外发布的中国新闻，例如新华社的对外部，各个部委的外事局，各

个旅行社的翻译、导游。如果说真正从事官方和新闻出版，不算旅游局的导游，从事中译外的人数并不是很多。第三类就如同中西医结合的大夫一样，同时精通中西医的。咱们国家在一些重要场合出现的医生，那都是中西医结合得很好的。那中译外、外译中都比较精通的翻译有没有呢？有。但人数绝对不多。这个专业化首先要自身的翻译很好，看是否适应两种语言的翻译。如果两种都适应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每个专业的翻译都适合做，既然这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那就是要细化。

第二个原因是管理不善，这主要是指管理层。一个县要出一个英文的简介，花很多钱进行彩色印刷，为何就不能去找一个真正能够从事中译外的人来做简介的翻译呢？他们可能就找了一个本县的中学英语老师，因此就出现了“prostitute factory”（妓女工厂）这样的错误。这个问题说轻点是管理不善，说严重了是外行当家。遇到一项翻译任务，我们往往会提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翻一些重要的文件，还需要请来起草人，因为稿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新概念。翻译不可能是“万金油”，不可能是经济专家、科技专家、教育专家、政治理论专家，因此需要原作者进行相应的解释。但往往有的管理层会不高兴，觉得就是简单翻译一下，你们哪里来的那么要求和问题。有一次，我们翻译中国 80 年代的法律汇编。我进行主持工作，翻译后让外国人改，然后再找人核订，我知道每个法都需要两个人的核订，因此我就组织了几位老先生来做这项工作。他们都是我国第一批最优秀的中译外的老专家，一部分人已经不在世了。之后，我就和有关部门说，书的前言里面感谢了許多人，唯独没感谢这些翻译和定稿人；翻译还好说，但这几个定稿人起的作用非常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把中国的法律用英文介绍出去。我还解释说“他们都是译审，相当于大学的教授”，但回答是“否”。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往往是在中文阶段时间充裕，反复推敲，到了翻译这里，给的时间有限，甚至是临时才想起需要翻译，总是认为“不是翻翻嘛”。这样一是不能很好地保证

翻译质量，二是对翻译的声誉也是很有影响。

第三个是属于翻译本身的问题。翻译的职业道德水平应该提高，不能急功近利，有钱就行。我认识很多翻译，明明不够水平，自信心却很强，任何稿子都敢接。在2007年11月广东佛山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翻译界人士又一次联名提到了此问题，即翻译本身要讲究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就是指专业化，不要见稿子就翻，有钱就翻。另外，翻译要讲诚信，虽然翻译有时候隶属于各个部委，但更多的是为翻译公司服务。翻译往往是一种个体性的劳动，即使三个人一起翻译一本书，但还是三个人，所以翻译基本上是个体化劳动，因此就有个人诚信问题。不能做的，因为时间或能力问题做不了的，一定不能接！这样会害人又害己。

第四个是整个社会的理解问题。社会的理解是跟整个社会对翻译行业的了解和认知有关。季羨林老先生的《病榻杂记》中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在去年接受中国翻译终身成就奖时所作的书面发言。他说：翻译与创作还不同。有一个政府高级官员是翻译出身，曾经说过，作为官员，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直接用外文交流。我交流的是我所熟悉的行当，我想说的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但如果我给别人当翻译，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我必须说什么。这是一个再创作。因此名家、大家都承认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是这个社会对此的认知度却并不高。这不仅仅是一些管理机构的人，就是很多普通人，也往往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机械劳动、熟练工种，很少认为是一种学术性的创作。

中译外有其重要性和特殊的困难，我们是孤独的中国翻译。因为国际上，翻译界有一种理论。前年在芬兰召开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大会由五六十场专题论坛组成。其中一个论坛有200多人参加，而一般的论坛都是二三十人或是五六十人参加，200多人参加的论坛是五六十场专题论坛中规模比较大的了。那个论坛的主题是“Translating from mother tongue into foreign language is a wrong



choice”。我参加了这个论坛，并做了发言。发言时我讲到对于英国人来说，要把英国的一百本、一千本，甚至是一万本书翻译成法文，不需要英国人来翻，因为有足够多的法国人懂足够的英文，他们会把英文翻译成为他们自己的母语法文。倒过来，如果法国人要出一万本书或是翻译一万份文件，就有一万个英国人能够承担这个任务。大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Translating from mother tongue into foreign language is a wrong choice**”，但对中国的翻译而言则是“**It's a only choice**”。试想，现在世界翻译界能有一万个英语国家的人能够把一万本中国的书翻译成英文？就算把美国、英国、新西兰、南非等所有英语国家都加上，是否有一万个职业翻译能够把中国每天大量的信息翻译成英文呢？没有！那这个事情就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做。后来，我在那次论坛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有 13 亿人口，由于历史原因，外国人除了少数几乎都不懂中文，因此我们只能自己做中译外这件事。从翻译的角度讲，与中国命运相似的不是大国，而是世界上一些人口较少的国家。比如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场合问：“有人懂阿尔巴尼亚语吗？”基本上没人答应。马其顿、芬兰、匈牙利这些小国的语言不像英、法、西、德等语言同属拉丁语系，比较接近，而这些国家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跟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因此，我们是“孤独的中国翻译”，这是以己之短攻人所长。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这事不可为，还非要为之。所以，在历次开会的时候，我都会强调语言学习要从娃娃抓起。

过去，中国都不太强调语言翻译，是因为过去中国的对外交流少。中国人买机器或进口一批设备，进口一种药品，找研究所的人翻译一下就可以了。各个部委的外事局出访的次数少，几个翻译就足够。但现在任何事物都要对外介绍，对翻译的需求量就大幅增加，造成这个问题也异常地突出。因此对翻译的重视要从几个方面来说，我们教育界要加强对中译外人才的培养。现在有一个可喜的现象，